

從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論及 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

白謙慎

美國波士頓大學

〔內容提要〕在中國書法的創作和收藏中，應酬書法是一個極為普遍但又從未被學者們認真加以研究的現象。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在現存的中國古代書法作品、特別是明清以後的作品中，除去書家們的信札和日課作品，為應酬而創作的作品在數量上是遠遠多於為適情自娛而創作的作品的。明末清初書法家傅山（一六〇七—一六八四）一生書寫了數量極多的應酬書法並留下了許多關於應酬書法的文字。而許多這樣的作品和文字又多和他的摯友、清初北方著名的藝術收藏家戴廷枏直接有關。本文即從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入手，引出中國書法藝術中應酬作品這個藝術社會史的問題，並在對這個問題的描述和分析之上，進一步探討一個理論性的問題，即中國書法中的修辭問題。

一、戴廷枏及其與傅山的交往

對於研究傅山的學者來說，戴廷枏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字。我曾在〈傅山的友人韓霖事跡補遺〉一文中說過，研究明末山西的文化，有三個人物值得特別的注意，即朱之後，韓霖和傅山。【註一】而在研究清初山西文化時，戴廷枏則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人物。不但傅山在其著作中經常提到戴廷枏，清初山西的許多文獻（包括傅山的一些著作）亦都賴戴氏的努力而傳世。但至今未見有專文對清初北方這一重要的文化人物予以討論。【註二】

戴廷枏的生年不詳。山西學者尹協理在〈新編傅山年譜〉中，將戴廷枏的生年訂為一六一八年，【註三】但未交代出處何在。傅山在康熙辛酉秋（一六八一）為戴廷枏的《半可集》所作的跋文中稱「先生今年五十九歲矣」，【註四】倒推上去，戴廷枏應生於一六二三年。戴廷枏本人在〈總督江楚應曉兵部左侍郎袁公傳〉中追述自己少年時代追隨袁繼成的經歷時，有如下文字：「先生（指袁繼成）崇禎丙子於太原三立書院課士，諄諄勉誡士子，先德行而後文藝。枏髫年同陽曲傅山、曲沃衛蒿等侍側」。【註五】袁繼成於崇禎甲戌（一六三四）七月出任山西提學，丙子（一六三六）重建三立書院。如果戴廷枏那時就成為袁門弟子，算得寬些，稱之為「髫年」，和生於一六二三年的推算還不至有很大的抵牾。所以戴廷枏生於一六二三年左右的可能性大於一六一八年。

戴廷枏祖上本為山西代州人。「洪武初年，枏始祖成忠自代遷祁，田於縣東北三十里，成聚，因名其鄉為戴家堡。」【註六】祁縣「處太原南，南接太行，北注汾水。歷漢唐宋代多偉人。」【註七】（圖一）在明朝，戴家是祁縣有影響的世宦家族。戴廷枏的曾祖父戴賓以大名別駕晉階奉訓大夫。祖父戴光啓，字仲升，隆慶辛未（一五七一）進士，官至布政使。致仕後「構適自園，偏日與所善遊讌詠間，為詩及小詞，俱清綺有致。又采彤家言，葺學宮，立書院，建文昌閣，祁文人以故日盛。」【註八】父戴運昌（一五七九—一六六七），字震存，號止庵，光啓次子。崇禎丁丑（一六三七）進士，官至戶部

【註一】：白謙慎：〈傅山的友人韓霖事跡補遺〉，《山西大學學報》，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頁三八。

【註二】：筆者所見藝術史學者的論著中涉及戴廷枏者，僅傅申先生〈王鐸及清初北方的鑒藏家〉一文。載《朵雲》一九九一年，第一期，頁七三—八六。傅申先生在文中將戴列為清初北方重要的收藏家之一。

【註三】：尹協理：〈新編傅山年譜〉，《傅山全書》（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第七冊，頁五二三—三。

【註四】：同上，第一冊，頁四二〇。

【註五】：戴廷枏：《半可集》，（劉雲編輯本，一八五三）卷一，頁三九b。

【註六】：同上，卷三。

【註七】：《祁縣志》（乾隆四十三年修刊本），卷三「山川」，頁八a。

員外郎。崇禎末，以誣入獄。事白出獄後不久，遭國變，【註九】「即歸里，入鹿臺山，不再入邑城，不與時官往來。凡禦侮弭釁者，子廷斌一人任之。……鹿臺山者，去祁邑六七十里，荒瘠而多虎。先生創築小砦居之，墾山而田，歲頗有穫，山民因之，稍稍成聚。」【註一〇】崇禎丁丑榜，山西全省成進士者共十九人。除一人死於戰亂外，國變後僅戴運昌和楊蕙芳兩人拒絕仕清。對於戴運昌這位能堅持遺民立場的前輩，傅山是深懷敬意的，他稱戴運昌和楊蕙芳這兩位前輩是「出處之際，爲山西養廉恥者。」【註一一】

戴廷斌和傅山的友誼始於三立書院時。傅山在爲戴廷斌文集《楓林一枝》所作序中，曾對兩人的交往有如下的描述：

楓仲髫年，受知於袁袁山先生，許以氣節文章名世。丙子，吳中丞鹿友與袁師同志，拔晉才士三立書院課藝。楓仲聲噪社中，少所許可，獨虛心向余問字。余因其蚤慧，規勸之。甲申後，仲斂華就實，古道相勗，竟成歲寒之友矣。【註一二】

作爲官宦子弟的戴廷斌在三立書院時，以應制文章頗得明末文壇領袖馬世奇、張溥等人的賞識。但由於傅山在明末不僅在山西文人圈中被目爲祭酒，他在全國的士林也享有相當高的聲譽，少年躊躇滿志的戴廷斌，對這位博學而又多才多藝且年長十餘歲的學長，深懷欽佩，凡爲文、爲詩常請教傅山，在書畫藝術方面也從傅山遊。戴廷斌與傅山之間這種亦友亦師的關係一直持續到傅山的去世。

甲申國變後，社會政治的巨大變遷給昔日的生活帶來巨大的影響。在山西，那些在政治上對滿清採取不合

【註八】：李維禎：《河南右布政戴光啓墓志銘》，《祁縣志》，卷一四「藝文」，頁一三 a。

【註九】：此事傅山在爲戴運昌所作傳記中所記甚略。見《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三四八。傅山在致戴廷斌一札中云：「闖賊破京師，楓仲在圍城中，見聞必確」。（同上，頁四八一）當是甲申國變時，戴廷斌爲父親的獄事羈留在京。

【註一〇】：傅山：《明戶部員外郎止庵戴先生傳》，同上，頁三四八。

【註一一】：同上，頁三四九。

【註一二】：同上，頁三六七。

作立場的舊王孫的處境往往都十分困難。出身明朝官宦世家的傅山，家境本殷實，但在戰爭中財產受到嚴重損失。國變後，他也失去了以往政治上和經濟上的許多特權。爲了生計，傅山不得不行醫賣字。他在太原市內開了一家藥店。在五十年代初，還曾經和一些朋友計劃盤下一家舊酒店。【註一三】但大約由於清初北方缺糧，【註一四】清政府對釀酒和開酒店有嚴格控制而未果。【註一五】入清後，貧困一直伴隨著傅山。在傅山的許多文字中，我們都能感到這位舊王孫爲了養家餬口所作的種種艱難努力。不過，在當時山西的舊王孫中，也有少數人的資產由於地域或其它的原因，在戰爭中未受嚴重損失，或是由於本人有經濟才能，能在戰後通過自己的經營能力來重新聚集財富。戴廷枏就屬於這類舊王孫。傅山曾稱贊戴廷枏「力學而明於古今是非，有心計，爲人在儒俠之間。」【註一六】稱戴廷枏有儒風，是因為國變後，戴廷枏和傅山一樣「窮極著書」，【註一七】不仕新朝。說戴廷枏有俠氣，是因為他好交遊，爲人慷慨。稱他有心計，是因為他精明而有幹才。明清兩朝，山西商人聞名天下。儘管，並無具體的存世文字證明戴廷枏曾經商，但從戴廷枏在清初戰亂之後仍能購買在戰爭中流散的私人書畫收藏，並且傅山多次請他代辦一些經濟事務來看，他很可能經商並有相當可觀的收入。

經濟實力使戴廷枏成爲清初北方重要的收藏家。明清之際，山西的文化在全國範圍雖說不算發達，但山西的書畫收藏卻頗可觀。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明初分藩時，朱元璋曾把許多藝術品分贈給太子們。分藩太原的太子朱櫛就藏有大量的書畫。至明末，許多官家藏品已流入私人收藏家手中。改朝換代之際，總是藝術品易手最爲頻繁的時期。清初在經過戰亂後，

【註一三】：劉九庵先生曾示余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傅山致友人書札照片，札云：「正擬一紙問酒館。此口即舊館新開之。所須酒人觴政下有法令，館人必肯承下」。

【註一四】：清政府在清初曾在山西多次因災荒免稅，證明當時山西十分缺糧。參見《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卷三—四。

【註一五】：雖然順治年間的禁酒資料尚未發現，但康熙朝多次下令禁止北方缺糧地區釀酒。參見范金民：《清代禁酒禁麴的初步研究》，載《九州學刊》，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九一年一〇月），頁八一—一二三。

【註一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三八四。

【註一七】：傅山：《明戶部員外郎止庵戴先生傳》，頁三六七。

私家藝術收藏又有新的變動。自從明末山西最大的收藏家韓霖死於戰亂後，戴廷枏在清初成為山西最重要的藝術收藏家。戴廷枏曾撰「畫記」一文自述其繪畫收藏的經歷：

太祖高皇帝平定海內，收元之圖書珍玩藏諸御府。諸王分藩，各有所賜。久遂散逸民間。經亂後，紛然四出矣。余篤好書畫，二十年勤求不遺餘力。【註一八】

在戴廷枏的繪畫收藏中，最精采的便是一批宋元畫。當時陝西著名的收藏家王弘撰（一六二一—一七〇二）在跋戴廷枏所藏宋元畫冊後曾這樣寫道：

戊申（一六六八）秋七月，余將有事於燕趙，道經昭餘，與戴子楓仲為傾蓋交。酒間出所藏宋元人畫冊屬題。聞初收無慮，數百幅積十有餘年，而擇之以存者廬如此，亦不易矣。夫畫書之流而藝之微者也。昔人以之澄懷觀道。戴子博學好古，又與傅青主先生及壽毛輩遊，故鑒賞之精，有如然犀，非他好事者比也。天下倜儻高妙之士，不得於時，其志鬱而莫申，類有所寓。戴子其然乎！【註一九】

根據戴廷枏本人的記載，他的藏畫中有如下宋畫：馬遠、馬麟、劉松年、蘇漢臣、及無名宋畫院畫工冊頁等數幀。【註

二〇】

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藏有曾由韓霖收藏的北宋著名畫家燕文貴的〈溪山樓觀〉山水畫卷。此卷後有傅山長跋，備述這一手卷在明末清初的種種遭際：

此偏關萬金吾家藏而轉之太原潘氏。董太史曾向潘借致京邸臨七八日，今董太史容臺雜著載之甚詳，所云燕文貴畫借自潘氏云云即此卷也。舊有董太史親題一段於後。先帝癸未絳孝廉韓雨公來太原，潘氏見之。韓既精鑒賞，而一生書畫之契又莫逆於董，見而愛之，遂重構於潘氏，收之行笥中，以為寶，笥寄之省城。遭亂，散失誰何。俗人見有董

【註一八】：戴廷枏：〈畫記〉，《半可集》，卷三。

【註一九】：王弘撰：〈書宋元人畫冊後〉，《砥齋集》（康熙年間刊本），卷二。

【註二〇】：同註一八。

字，遂割去，獨遺前畫紙槎無人顧。道士王清虛者過市，認得是雨公箚中舊物，易而度之東甕城靖以待價。祁戴仲過靖見之，訝其筆奇古，清虛告其來歷。戴中徵諸貧道，貧道曰然。戴仲遂以雨公之愛愛之，重裝寓目。此卷既不得於韓，而終能遇戴，可謂良會。戴仲好古董法書器皿，見之若得，不惜列劃田舍而有之，今之奇人也。余曾見雨公一舊紫端硯，隨用之有年矣。亂後亦歸於王清虛，堅潤無比。戴仲既用白口五十錢易歸文房，可謂口好。如此高韻，豈得一世。僑黃山題。（圖二）

燕文貴的畫蹟在清初已極為罕見，雖正值戰亂後，畫價會低些，但其價格比起其它的畫來說，仍應更昂貴。戴廷枏能「以雨公之愛愛之」，不遺餘力地收藏戰亂後流落各處的韓霖舊藏，既說明了韓霖在明末清初山西文化人心目中所享有的文化聲譽，也展示戴廷枏雄厚的財力。【註二】

除了古畫外，戴廷枏也收藏當代人的繪畫。現上海博物館藏戴本孝畫山水冊十二開，有傳山對題。傳山款為：「舊作憶書，不復計戴晉人之笑我。七十三歲病夫傳山」。這件作品很可能是在一六七八年底或一六七九年初傳山因博學鴻儒特科考試被徵入京時，為戴廷枏所書。而戴廷枏可能是在北京得到戴本孝的作品後請傳山對題的。

戴廷枏的藏書樓為「丹楓閣」，其藏書在戰後的山西大概也是最多的。戰亂後，傳山的藏書大多散失，所以他常向戴廷枏借書來讀。由於傳山學問好，明末清初又尚批點，所以傳山常在戴廷枏借他的書上批點，戴的藏書亦因此增值。傳山在致戴廷枏一札中言及借書事：

弟往日所看過《國語》、《公》、《穀》二傳，皆遺失矣，偶一臆之如夢。求兄所藏此三書便中付弟，特為一點，不難也。《唐詩彙紀》鄴架可有否？若有，亦願借考數月。【註三】

除了收藏書畫和書籍外，戴廷枏還收藏古代器物。清初著名詩人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曾作詩詠〈戴氏鼎〉，

【註二】：韓霖舊藏元代女畫家、趙孟頫之妻管道昇所畫山水小軸在戰後也歸戴所有。見戴廷枏〈管夫人小畫記〉，《半可集》，卷三。

【註三】：《傳山全書》，第一冊，頁四七五。

注云：「爲楓仲作，同山長教授，愚山侍讀。多父敦亦戴氏物」。【註二三】

由於戴廷枏富於書畫收藏，傅山及其友人在和其他地域文人或官宦的交往時，對喜歡收藏古字畫文玩的官僚的餽贈，也多由戴廷枏來應付。戴廷枏曾有「題傅公它（傅山字）畫壽楊猶龍」等詩。【註二四】楊猶龍（一六二一—一六六三）即楊思聖，河北人，順治三年進士。順治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楊思聖由國子讀學授山西按察使。【註二五】楊思聖在山西期間，曾折節訪傅山。傅山和戴廷枏與楊思聖過從甚密。傅山曾多次爲楊思聖作書畫。傅山〈與戴楓仲書〉云：

弟昨入城，擬一見臬司，而少禮，勞爲賒茶扇充之。今日想不得見，兄若面時，復當先爲展意。【註二六】又一札云：

臬司畫冊，不得不應，恐畫成促裱，則無邊材，求兄先爲之地，不必宮綾，但淡月白絹即可耳。【註二七】臬司乃按察使別稱，此處當指楊思聖。由於傅山和戴廷枏關係極深，有時戴廷枏寄存在傅家的古畫，在未徵得戴廷枏的同意下，徑自借與他人。傅眉致戴廷枏一札就告訴我們這樣的事情：

計翁先生覓李將軍畫，即借留寓中者送入街矣。然亦知其爲先生物也。【註二八】

此處所言計翁，乃太原知府周令樹（字計伯）。周令樹在山西任官期間，和傅山，戴廷枏過從甚密。

戴廷枏不但收藏書畫和書籍，他還以自己的經濟實力來刊刻書籍，贊助山西的文化事業。有感於山西文化的凋零，戴廷

【註二三】：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三七，頁四a—五b。《帶經堂集》卷一三中尚有〈題戴楓仲丹楓閣圖，圖山長作〉（頁七a—八b）及〈又題馮仙湜畫贈戴楓仲〉（頁八a）。

【註二四】：《傅山全書》，第七冊，頁五一—一九。

【註二五】：錢實甫：《清代職官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頁一九八三。

【註二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七八。

【註二七】：同上。

【註二八】：同上，第七冊，頁四九〇二。

栻在一六六二年刻《晉四人詩》，收傅山、傅眉父子和傅山的摯友白孕采、傅山的弟子胡庭四人作品。戴廷栻本人的敘和凡例，把刊行此書的動機交代得很清楚：

丙申春，與公它先生徘徊崇蘭老柏下，倦念晉之文人才士凋謝殆盡，幸先生與居實（謙慎案：白孕采）在，今壽毛（謙慎案：傅眉）、季子（謙慎案：胡庭）繼起，皆一時高才，而淹留草野。欲稍梓篇章，以各備晉人一種。【註二九】在凡例中，戴廷栻進一步寫道：

余但念夫晉之淹留林草荒蕪貧賤之詩人，不惟篇集失遺，抑亦姓名湮沒，行當搜梓，以各備晉人一種，此但以四人爲先驅耳。願晉人之同志者，有所秘藏，悉以誨我。【註三〇】

從目前存世的清初山西文獻來看，戴廷栻無疑是當時山西最重要的文化與學術的贊助人。傅山晚年的書法彙刻《太原段帖》也是在戴廷栻的贊助下完成的。【註三一】

戴廷栻還在經濟上給予困境中的傅山種種幫助。存世的傅山書札，大多數是寫給戴廷栻的。其中許多都言及經濟上的問題，爲我們瞭解傅山在清初的生活留下了珍貴的記載。爰錄數通於下：

元仲以貧不能出門，遂遲遲至今，始得來省。欲至昭餘（謙慎案：即祁縣）乞米，所望不奢，三頭兩石即足。【註三二】
薏米瓜乾情至，謝謝。【註三三】

爲兄作畫一幅，金箋寫詩十幅，前高麗大字四幅，粗能復約，今並付伴到記室。……老親一年來病多，幸稍調全矣。

【註二九】：戴廷栻：《敘〈晉四人詩〉》，載《傅山全書》，第七冊，頁五〇六九。

【註三〇】：戴廷栻：《〈晉四人詩〉凡例》，同上，頁五〇七一。

【註三一】：傅眉（即事爲叔玉兄勸酒）一詩有「昭餘戴晉人，聞之生禪喜。以我之齋廬，盆盎貧如洗。饑寒不自顧，分半爲此事」句。是知，段叔玉所刻《太原段帖》有部分是戴廷栻出資。見《傅山全書》，第七冊，頁四八二七。

【註三二】：同上，第一冊，頁四七〇。

【註三三】：同上，頁四七一。

前六七日，偶爾失足，臥床呻苦重甚。正欲走力求兄台，先爲我問貴縣粗布六十疋，但尺頭長者。弟素無經幹之能，心膽荒亂，不得不謀之良友。孟中有少資斧，促忙取不到手，到即專奉，且先問之。【註三四】

傅山求戴廷枏買布一札大約寫於一六六零年。是時，傅山的母親已病重，傅山開始爲料理後事做準備。【註三五】所謂「孟中有少資斧」當指在孟縣的朋友處，傅山賣字後有些款子尚未收到。類似的文字在傅山致戴廷枏的書札中屢見不鮮：

聞祁縣米麥價頗賤於省城，欲煩兄量米八兩、麥六兩者，爲冬春之備。【註三六】

付許管銀一十六兩，求買米八兩，麥六兩，餘二兩儘買香油可也。尚須麻油百斤，價再補來。【註三七】

：弟欲理前約，爲嵩、少之遊，稱此老病未死，略結此案。求兄一腳力度我，臨時並欲求勞一得力使者幫之也。……費欲以一二字畫賣而湊之，不知貴縣能有此迂人否？先此問之。【註三八】

東省李吉老適有信來要弟東游，弟即趨其約，似且不果。嵩少之行，吾兄亦復省此勿遽也。弟擬初三日發，但借一好牲口、一僕力扶掖老四大上下耳。資斧不勞經紀，極能寬吾兄連日不訾之費。弟復何忍，何忍？《楓閣記》即擬書之，送牲口人到即付之。【註三九】

從買米、買麥、買布、買油，賣字畫籌措經費，到提供出遊時所用的腳力和牲口，戴廷枏簡直就像是傅山的經濟代理人。同時我們也看到，傅山的許多書畫作品是由戴廷枏經營出手的。如上面提到的，傅山爲出遊籌備盤纏時，就寫信給戴廷枏，請他在祁縣幫助賣一些字畫。

【註三四】：《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七二。

【註三五】：傅山的母親在一六六〇年去世，傅山在致戴廷枏的下一札中云：「弟以新慘，心緒不能即定。」同上，頁四七二。

【註三六】：同上，頁四七六。

【註三七】：同上，頁四七四。

【註三八】：同上，頁四七七。

【註三九】：同上，四八〇。

對於戴廷枋的幫助，傅山能夠報答的就是為戴廷枋作書畫，刻印章，和為其及其家屬看病。在上引文字中，傅山提到為戴廷枋的丹楓閣撰寫題記即為一例。傅山還常為戴廷枋題畫，在致戴廷枋一札中，傅山說：

畫俱題過，付來力。千字文捉工亦得草完，今始報命。【註四〇】

由於傅山的名聲大，經他品題後，藝術品的價值自然增加。傅山和其子傅眉（一六二八—一六八四）還擅長篆刻，傅氏父子曾為戴廷枋及其友人刻印。傅山在致戴廷枋一札中這樣說：

慎虛詩石章，少待兒眉勒就，便復報之。【註四一】

傅山還常為戴廷枋的收藏作題跋。不但如此，他也為戴廷枋的收藏提供諮詢意見，如前面提到的，戴廷枋在購買燕文貴的山水畫時，就曾徵求傅山的意見。有時傅山則直接代戴廷枋購買文物。在傅山留下的文字中，這類的記載也不少：

宣爐看住一個，價只三兩，亦頗廉矣。到手即寄記室。【註四二】

由於戴廷枋為人豪爽，交遊廣泛，他在當時全國的士林也享有相當的聲譽，過境士子，咸拜訪之，以致有人這樣說，「海內名流，南方多聚於水繪園，北方則丹楓閣，稱極盛焉。」【註四三】水繪園為當時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冒襄（一六一一—一六九三）的庭園，人們把戴廷枋的丹楓閣與當時文化中心江南的水繪園相比，足見戴廷枋在當時文化人心目中的地位。傅山不但曾為丹楓閣撰寫過題記，還畫過丹楓閣圖。清初詩壇領袖王士禛也曾吟詠戴氏丹楓閣。【註四四】清初大儒顧炎武（一六一三—一六八二）旅居北方時，常館戴廷枋家。戴廷枋還曾專程在祁縣南山為顧炎武建造書堂，提供學術研究的物質

【註四〇】：《傅山全集》，第一冊，頁四七八。

【註四一】：同上，頁四七二。在致戴廷枋的另一札中，傅山也寫道：「圖書亦許再報」。（同上，頁四八三）「圖書」此處也指印章。傅山以印章為人應酬者不多，因有種種不便：（1）耗時性（有時刻銅印），不似書法可迅速完成；（2）不像書畫那樣可懸掛展示。

【註四二】：同上，頁四七一。

【註四三】：丁寶銓：《傅青主先生年譜》，載《霜紅龕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影印丁寶銓刊本，一九八六），頁一二八六。

【註四四】：王士禛：《帶經堂集》卷一三，頁七a—b，〈題戴楓仲丹楓閣圖〉。

條件。【註四五】

十七世紀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在山西境內形成了一個重要的學術圈。當時著名的學者文人如顧炎武、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閻若璩（一六三六—一七〇四）、李因篤（一六三一—一六九二）、潘耒（一六四六—一七〇八）等都活躍於這個學術圈中。戴廷枏亦是其中的積極分子。【註四六】《昭代名人尺牘》中收有清初著名學者李因篤和閻若璩致戴廷枏的信札兩通，所云皆與學術有關，戴廷枏和當時著名學者的交往可見一斑。李因篤致戴廷枏信札云：

拙著三種請正大方。前奉三書不識俱徹掌記否？夙好落落如對晨星，每一念之，胸懷苑結。附候潭禧。楓翁先生詞宗，同學弟李因篤頓首。【註四七】

閻若璩至戴札云：

王山長先生畫卷、詩扇何日有將？有人歸故山，欲付之耳。行期何日？須確在三日前來說聲，好作黑松莊札子，並訂不既，楓翁先生。弟閻若璩頓首【註四八】

戴廷枏有一子，名記，字經倩，孫一，名茂實，字文甫。戴記習舉子業，企望通過科舉步入仕途。為此，當時作為明遺民的父親戴廷枏，雖非十分情願，但也無奈。傅山有一文談及此事：

楓郎記不甘心帖括之不一識也，而為祁諸生。崖翁曰：「是當賀耶！」楓蹙蹙然曰：「強子弟為今日之諸生，罪且不勝誅，何賀之云？賀之過於誅之！」崖翁顧知其語之非偽也。司農公不仕於今，而得蕭然為林下完人，亦由楓之以諸

【註四五】：李因篤：《答戴楓仲見懷詩兼申別緒五首》之三自注云：「顧亭林將起山堂祁之南山，戴力任之」。《受祺堂詩集》（康熙三十八年田少華刊本），卷一八，頁四a。

【註四六】：參見白謙慎：《十七世紀六十、七十年代山西的學術圈對傅山學術與書法的影響》，載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五期（一九九八），頁一八三—二一〇。

【註四七】：吳修審定、馮瑜等刻《昭代名人尺牘》（道光六年），第九。

【註四八】：同上，第一〇。

生爲彌縫也。且祁俗薄肺腑之交，四五望家莫不窺其隙而中之。諸生兩字，殆如臨陣相鎧然，故不敢不爲。楓唯郎，而益覺不爲諸生之不可處祁也，是誠不足賀。【註四九】

明清改朝換代之際，各地的豪紳借政治權力的轉換時機，重新瓜分地方上的政治和經濟利益。戴廷枏之子之爲諸生，固然有傅山所提到的祁縣幾個大家族之間的紛爭的因素，壓力也可能來自戴家內部。戴廷枏的伯父戴濬昌之子戴廷枏、之孫戴上在清順治年間就都已成爲舉人。【註五〇】這種通過科舉而走向仕途，毫無疑問會加強他們在地方上的爭權奪利中的實力。實際上在清初，各地漢族精英的子弟習舉子業就已相當普遍。清初學者戴明世（一六五三—一七一三）曾說：

自明之亡，東南舊臣，多義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習舉業，舉科第，多不以爲非。【註五一】

山西雖非東南，然亦有類似情況。戴廷枏之子戴記急切地要在清政府中謀上一官半職可由另一件事說明。顧炎武在寫給親戚的信中提到他從山西移至陝西後，急需金錢購買房屋土地，但「山右行囊五百金寄戴楓仲者，爲其子竊去，納教諭之職。以此捉襟見肘，尙未有就。」【註五二】此事以後如何了結，不詳。大概總由戴廷枏來償還。【註五三】但它至少說明了明遺民下一代對清政府的態度和父輩已很不相同。而不少明遺民對此也基本上採取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註五四】

一六七八年，傅山被薦參加博學鴻儒考試。雖幾經推辭，但終被迫入京。戴廷枏牽念千里之外的老友，專程趕到北

【註四九】：傅山：《賀楓仲得孫》，《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五三二。

【註五〇】：《祁縣志》，卷六，「選舉」。

【註五一】：戴名世：《南山文集》（光緒二十六年刊本），卷八，頁一三。

【註五二】：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二，第二版），頁八七。

【註五三】：顧炎武：《與原一公肅兩甥》云：「久滯山右，因行囊爲人所竊，待其吐償」。同上，頁二一四。

【註五四】：傅山的友人、明遺民王弘撰的兒子也走了和戴記相同的道路。其友李因篤還爲此撰寫了《王山史先生次子仲和補博士弟子員序》，見《續刻受祺堂文集》（道光七年刊本，一八二七），卷二，頁五五a—五五b。顧炎武的三個外甥皆爲清朝高官。關於明遺民子弟習舉子業、出仕的論述，見何冠彪：《論明遺民子弟的出仕》，載《明末清初學術思想研究》（台北：學生書局，一九九一），頁一二五—一六八。

京，看望病中的老友。此事在京師一時也傳為美談。【註五五】而在北京期間，作為收藏家的戴廷枋很可能也收藏了一些書畫。【註五六】同時，戴廷枋在京期間，還請人為他的收藏題跋。如他在戊午冬，曾請當時也應試在京的陝西學者、收藏家王弘撰為其題丹楓閣冊子。【註五七】這些都說明，戴廷枋在清初的文化圈子內十分活躍。

一六八四年，傅山及其子傅眉相繼去世，兩孫連蘇（一六五七—一七三七後）、蓮寶尚未能立足，戴廷枋從祁縣趕到太原，為這位交往了五十餘年的老友操辦了喪事，並請傅山在陝西的好友李因篤撰寫傅山傳。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李因篤曾有長信寄戴廷枋，從中可知一斑：

公他先生橋梓歿而相繼蒿京，人之云亡，瞻烏爰止。此郭林宗所為飲泣中野，固難一二與世俗言也。伏承足下古道深情，庇其棺斂，又駿奔禦侮，以撫遺孤。豈惟老友在天，永懷名德。凡叨交黨，能不傾心。至勒石之篇，責諸後死，弟雖譴陋，誼無所辭。俟足下撰狀西頒，即勉圖報塞，並走一介，薄展絮雞。他時晤足下汾水之涯，當攜素車白馬，往哭其墓。臨風灑酒，竟日悲歌，終不使孺子生錫獨行千古也。【註五八】

戴廷枋在其晚年出任山西聞喜縣訓學。【註五九】

【註五五】：儲方慶：〈太原傅先生病臥燕京，其友戴君不遠千里來視之。余高戴君之義，亦知先生能擇友也，賦詩紀其事〉，載《傅山全書》，第七冊，頁五〇〇八。

【註五六】：上海博物館藏戴本孝、傅山書畫合冊有戴本孝山水十二開和傅山的對題。傅山落款云：「舊作憶書，不復計戴晉人之笑我。七十三歲病夫傅山」。筆者以為戴廷枋很可能是在北京期間得到戴本孝的畫的。戴本孝是年不在北京，畫很可能是他人攜至北京求售。戴請傅山在京作對題，因傅山在京期間，對外稱病，故有「病夫」二字。

【註五七】：見王弘撰：《書戴楓仲丹楓閣冊子》，《北行日札》（康熙年間刊本），頁一六b—一七a。王弘撰此時也把自己的收藏帶到北京。見王士禛《帶經堂集》，「戊午稿」，「同施愚山、陳謫公集山史從兄昊天寺寓，觀唐子華水仙圖」，頁一五a—一五b。

【註五八】：李因篤：《復戴楓仲》，《受祺堂文集》（道光七年都村拜石軒馮氏刊本），卷三，頁九一—一〇。

【註五九】：《祁縣志》，卷六，「選舉」，頁三五p。

傅山去世八年後，戴廷枏也在二六九二年去世。【註六〇】他的逝世使山西文化失去了最爲重要的文化贊助人。而他和傅山數十年的交往，不但是我們研究清初明遺民生活的課題，也是研究中國書法中贊助人問題的極好題材。

二、關於傅山書法中的應酬作品問題

近一、二十年來，藝術史的研究已從六十、七十年代對形式特徵的分析逐漸轉向對藝術社會史的關懷。在這種大的風氣之下，社會機制（social institutions）和藝術的關係，贊助人和藝術創作的關係，日益成爲學者們所關注的問題。這點在中國藝術史的研究中也有所反映。【註六一】研究藝術贊助人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能否在藝術家的藝術風格和贊助人的藝術趣味之間建立起一種對應的關係，否則的話，這一研究很可能就流於泛泛的交遊考。在歐洲，由於有悠久的文字合同關係的歷史，藝術品的訂單對畫作的藝術特點、使用的材料、交貨的時間、價格等常有具體的文字記載，爲研究贊助人和藝術創作的關係提供了可靠的歷史文獻。相比之下，中國古代文人書畫史卻沒有爲我們留下了很多這方面的文獻資料。

在研究中國文人藝術中贊助人的問題時，我們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贊助人和藝術家之間，究竟是誰影響誰的問題。我們不妨再以戴廷枏和傅山的關係爲例來討論這一問題。如果我們根據西方藝術史研究的標準，把那些在經濟上對藝術家提供幫助的人們稱爲藝術贊助人的話，那末，戴廷枏無疑稱得上是傅山的贊助人，他曾給予傅山種種經濟上的幫助。但我們在前面亦曾指出，戴廷枏和傅山之間存在著亦友亦師的關係。戴廷枏在請傅山創作作品時，有時會對作品的材料（是紙還是

【註六〇】：戴廷枏卒於康熙壬申（一六九二）。王士禛《王漁洋遺書》中有〈祁縣訪戴楓仲，見其子永豐令記，知以壬申歲逝矣。輓之一首〉。（《雍蓀集》，頁四b）山陽丁寶銓所撰《傅青主先生年譜》則稱戴廷枏「年七十四卒」。（附於《霜紅龕集》，第二冊，頁二八六）如此逆推，戴廷枏則生於一六一九年左右，和尹協理先生《新編傅山年譜》所訂戴氏生年相近。總之，戴氏生年待考。

【註六一】：關於這方面研究狀況的綜述文章，見傅立萃《有關中國繪畫贊助的研究》，載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第十五期（一九九八年六月），頁五五—七九。

綾，是扇面還是條幅），文字內容（如是寫「千字文」還是杜甫的〈秋興〉）提出要求，但對藝術風格不會有太多的干涉。中國文人藝術的贊助人經常自己也是文人或藝術家，比如說戴廷枏就是一位詩人，他也工書法。而傅山也收藏藝術品。社會角色的分離並不明顯。藝術贊助人有時候還直接從受到他們經濟贊助的藝術家那裡學藝術，他們對自己所贊助的藝術家，常執弟子禮。他們對藝術家的贊助，是一位弟子對老師的敬意。戴廷枏在收藏書法、繪畫時，常諮詢傅山，傅山的意見常是起決定作用的。從這點來說，常是藝術家的趣味影響收藏家，而非收藏家的趣味影響藝術家。一個很有說服力的證據是，密歇根大學美術館藏有傅山、傅眉父子山水合冊。此冊為戴廷枏舊藏，前有戴廷枏的小篆題簽，很像傅山的小篆，當受傅山篆書的影響。後有戴廷枏的題跋，其行書更是酷似傅氏。所用白文名章，似也出自傅山或傅眉刀下。（圖三）傅山的藝術趣味對戴廷枏的影響，可見一斑。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其它的文化領域裡。傅山的友人楊思聖、魏一黿（一六二〇左右—一六九二）、魏裔介（一六一六—一六八六）、湯斌（一六二七—一六八七）等皆為仕清官員，但對清初北方的理學大師孫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執弟子禮，追隨侍奉，既恭且謹，不敢有絲毫怠慢。而一些新朝的宦官，和傅山雖未有師生之誼，但對傅山這樣的舊王孫也十分的禮遇。明清鼎革並不是一場社會革命，它並未對舊有的社會文化結構予以本質上的改革。改朝換代對傅山的政治經濟地位雖有直接的損害，但他的文化聲望並沒受到影響。他依然擁有不可低估的文化資本。而擁有這種資本的文化精英，是能夠通過自己的藝術、通過自己的知識，在日常的交往中、在收藏家向他們諮詢時，對當時的藝術趣味予以積極的影響。傅山和戴廷枏的交往就能說明這一點。由於在研究中國文人藝術中，我們常不能在贊助人的趣味和受贊助者的藝術風格中建立起一種前者影響後者的對應關係，與西方藝術史中對贊助人問題的研究相比，這一研究視角在運用到中國文人藝術上時，困難很多，意義也相對小些。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就不可以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文人書法史。近年來，一些學者在中國書畫的社會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在中文的論著中，單國霖〈明代文人書畫交易方式初探〉一文，對明代書畫作品是如何經營的，周轉流傳的方式作了討論。單文指出了當時書畫周轉流傳的這樣幾種方式：人情酬酢方式；間接的賣畫方式；書畫的金錢交易方式。【註六二】在西文著作中，高居翰（James Cahill）教授關於中國畫家是如何生活和工作的近著 *The Painter's*

Practice最具有開拓性。在此書中，高教授對繪畫在各種場合的應用，買畫人或求畫人通過何種方式得到繪畫，酬謝方式是現款、禮物還是提供服務，乃至繪畫的製作過程，有相當全面的概括和論述。【註六三】但正如高教授自己所指出的那樣，他的這一著作更多的是對中國繪畫中的一些基本模式作探索性的研究，而非藝術史的個案研究。【註六四】正因為如此，他所討論的畫家和畫作，時間跨度從宋代到清代。在單國霖先生和高居翰教授都討論到的中國書畫的交易方式中，我以為人情酬酢與間接的買賣是最能反映中國社會文化特點的書畫經營方式。龔繼遂先生在一篇討論中國繪畫中的酬酢現象的論文中，直接採用「應酬畫」一詞作為中國繪畫中的一個畫種和研究這一社會文化史現象的一個概念，全面地討論了應酬畫的起源，種類、受畫人，社會功能。【註六五】我在一篇談論中國書法史研究方法的短文中曾說，龔繼遂關於應酬畫的研究對中國文人藝術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他的研究實際上開啓了一條不落西方學術窠臼的思路。【註六六】但龔繼遂的論文依然是偏重對應酬畫予以理論上的闡釋，徵引的文獻和畫蹟在時間的跨度上也是從宋代直至當代，而且這些文獻也以第三者而非當事人筆記中的軼事居多，因此算不上是嚴格的藝術史個案分析。由於傅山在和戴廷枏及其他友人的交往中留下了大量的應酬書法和有關的文字，本文以下也就將以傅山為例，詳細地討論清初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書法中的應酬現象。

在為應酬畫作定義時，龔繼遂把作為贈送品的畫統稱為應酬畫。龔繼遂所用的英文詞為「gift painting」，若直譯為中文，即「禮品畫」。但在使用中文時，龔繼遂採用「應酬」二字來概括這種繪畫，並指出，在中國，應酬是一個能涵蓋相當廣泛的社會現象的一個概念。筆者在同意並沿龔繼遂為應酬藝術品所下的定義的同時，認為在藝術品的買賣中，由於有人情

【註六二】：載《上海博物館館刊》，第六期，頁二四—三一。

【註六三】：James Cahill, *The Painter's Practice: How Artists Lived and Worked in Tradition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註六四】：同上，頁三三。

【註六五】：龔繼遂：《論應酬畫》（On Gift Painting）（英文待刊稿）。

【註六六】：白謙慎：《書法研究方法芻議》，載《中國書法》，一九九五年第三期，頁七。

的參與，很可能是半買半送，或是象徵性地收一點錢。因此，在討論中國書法史上的應酬現象時，本文認為，凡創作時不是為自己的抒情寫意進行創作，旨在應付各種外在的社會關係，或出於維繫友情，人情的往還，物品的交換，甚至買賣的作品，廣義地來說，都可以視為應酬作品。

和應酬作品相對應的，便是那些為抒情寫意進行的創作。中國文人畫家常聲稱他們的藝術是爲了「適情自娛」，如倪瓚所稱：「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註六七】筆者以爲，儘管我們不應漠視文人藝術中具有的實用因素，在中國文人藝術創作中，以自娛、抒情爲主要動機的創作一直存在。而且自娛和應酬各在書法創作中的比例，也常依時代的變更而有所不同。

在爲應酬書法下定義時，我們還要注意到這種現象，即一些原本不是用來應酬的作品，以後也可能被用來應酬，這種情況在傅山身上常發生。如傅山在一六五三年曾作小楷〈曾子問〉，並非爲了應酬。在保藏了三十年後，一六八四年傅山在向老友魏象樞（一六一七—一六八七）托孤時，將這件作品贈給了魏象樞。【註六八】一些書家平時的日課習作和嘗試性的作品，因名氣大了，也常有人索要。一些信札、筆記、藥方，興致所至和自娛的作品，也都會被用作應酬。但這些和爲應酬而創作的作品不同，這是我們在討論應酬書法時應予以注意的。簡言之，筆者在此把「適情自娛」以外的作品都統稱為應酬作品。因此，它是以創作動機爲定義基礎、爲討論問題方便起見而使用的一個不是特別嚴格周全的操作性概念。而這一概念的如此界定也和我們下面將討論的修辭（rhetoric）問題有直接的關係。

在爲應酬書法作了基本界定後，讓我們來接著上一節，討論傅山和應酬書法。上文在討論傅山和戴廷弼的關係時已指出，甲申國變後，作爲明朝舊王孫的傅山，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經濟特權，家庭的財富又受到戰爭毀滅性的摧損，傅山不得不以行醫與鬻書爲生。他曾說：

【註六七】：倪瓚：〈答張藻仲書〉，載《清閨閣全集》（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一九七〇），卷二〇，頁七a—七b。

【註六八】：關於這件作品，下文還將討論。

文章小技，於道未尊，況茲書寫，於道何有！吾家爲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我始苦應接。【註六九】傳山的祖上爲官宦和士紳（傳山的祖父和叔祖爲進士。傳山的父親一生未仕，在鄉里教書），傳家在明代，家境殷實，自然不必以鬻書爲生。到了傳山，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正因爲經濟困難，很大的生活來源得自書法，傳山在甲申後書寫了數量極多的應酬書法。又由於傳山一生好作筆記，他留下了比任何書法家都多的談論應酬書法的文字。傳山有致友人一札，言及以書法來換米一事：

寓中偶爾無米，父子叔姪相對長笑，頗近清虛，未免有待，而此面亦得空易卦也。偶有小金箋十餘幅在破案，因憶唐伯虎不使人間造業錢伎倆，作小楷《孝經》十八章，較彼猶似不造業矣。令兒持入記室，換米二三斗，救日月之枵，若能慨然留而發之，又復爲大陵一場話柄矣，真切真切。【註七〇】

此處所言「留而發之」，應該就是託友人賣字，來頂那二三斗米錢。傳山大概在太原、汾州、祁縣、孟縣等地都有友人作爲其書法的代理人。從我們在本文第一節所引的文字來看，戴廷枏就多次在祁縣爲傳山賣字。

但並不是所有的應酬作品都直接涉及這種金錢和物質的交易。在許多情況下，應酬書法的創作是爲了人情的交換。從我們在本文第一節的討論中，我們已看到，儘管傳山在和戴廷枏的交往中，有時是涉及金錢的，（如他請戴廷枏爲他在祁縣買米和油時，付給了戴廷枏銀子），但戴廷枏卻爲傳山提供了許多的服務，比如說，把米和油運到太原，爲傳山的出遊提供腳力。而傳山回報的方式便是爲戴廷枏寫字作畫題跋。

應酬書法適用的範圍極廣。從他人請去小住，吃飯喝酒，到給予各種方便，都可以書法表示感謝。傳山有許多的作品，便是這種情景下的產物。他有段小跋這樣寫道：

辛酉冬寓石艾張植元培兄峪里花園，壬戌三月旋里，書扇謝之。

長公與余善，今復識公孫。花竹綠溪水，亭池借小園。黃冠累月住，綠酒不時存。所喜仍荒徑，猶然若敝村。【註七一】

【註六九】：《傳山全書》，第一冊，頁八六三—八六四。

石艾在平定州。此處所說的張植，很可能是傅山的老友、曾任明朝大理寺卿的張三謨（日葵）的孫子。從詩中可以看出，傅山在老友的子家住了三、四個月，主人款待得十分周到。傅山無所以報，乃「書扇謝之」。【註七二】

一六五一—一六五二年左右，因清初動盪的局勢而避難山西各地的傅山，曾僑居在陽曲縣的友人楊方生家中。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藏有傅山此時為楊方生的兩個弟弟書寫的雜書長卷一件，當是爲了感謝楊家救助之恩所作。（圖四）

傅山喜歡喝酒，有時朋友備下酒席，並預備了筆墨，酒酣耳熱之時，請傅山作書，傅山也就乘興揮毫：

軼老詞宗以醉索書，書得〈村房即事〉一章，發笑，兼請教政。【註七三】

傅山不光要應酬官僚、文人、鄉紳們，他有時也爲鄉裡的人們寫字。鄉下人沒錢買傅山的字，也不能如有權勢者，可爲

【註七〇】：《傅山全書》，頁四九六—四九七。

【註七一】：同上，頁一九九。

【註七二】：高居翰教授在The Painter's Practice以"Hospitality—the Artist-in-Residence"來討論暫寓他人之家的畫家以畫來酬謝主人的現象。（見頁六五—六

七）但高教授的觀點未能擺脫贊助人——藝術家這一思維模式。如果筆者關於張植爲張日葵的孫子的推測對的話，那麼，傅山和張植的關係絕非贊助人——藝術家這種關係可涵括。張日葵作爲明末山西籍的高官和山西文壇領袖傅山的關係極深。傅山有詩證明，張日葵到他居住的村中去拜訪他。（見傅山：《葵老惠訪，病不能晤，期霜紅再理前約四首》，《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一三三）在傅山的友人中，仕清漢族官員魏一鼇是給與他幫助最多的一個。按照西方美術史的觀點，魏無疑是傅山的贊助人。但就是這位爲官的朋友，也曾拜訪傅山，在傅山家小住。傅山有一札云：「託胡子丹貽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旗復指大鹵也。果耳，不以官之遷否爲定。經歷廳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高興見訪，濁論一晤，只愁呂徽之不堪修主人耳。蕭寺下榻可也，未免清齋數日，當令酒道人（筆者案：魏一鼇號酒道人）作茶博士耶！然此示元夜之約安所來，弟無聞也。當且不出村門，此盼以待。來人勿勿索答，豈必濟？方在病家，當別不恭。草草致復，復厭起居。蛻眉亦在寓，會當領教。所聞藉藉，實過乎情。此醜須出後始定品藻耳。草復，都不寒溫。酒道人。」（同上，頁四九三—四九四）關於此札和傅山與魏一鼇的交往，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鼇：清初明遺民和仕清漢族官員關係的個案研究》，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三期（一九九六），頁九五—一三九。

【註七三】：《傅山全書》，頁二八八。

從傅山和戴廷斌的交往論及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修辭問題（上）

傅山提供保護和種種方便。但鄉下人能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一些幫助，在鄉裡的糾紛中，表示自己的同情，通風報信，使這位舊王孫感到親情，不會感到孤獨無助。在傅山的詩文中，我們能多少找到傅山為鄉裡貧窮漢書寫的文字。傅山有一組五言律詩記載有人欲用媳婦為傅山做的鞋來換傅山的書法，甚是有趣，爰錄二首於下：

龐內施鞋，漫為四首鳴謝。蓋郎原言欲換字也。

說與黃冠指傅山。傅山為道士，著朱衣，戴黃冠做，心防俗樣分。繡煙針腳隱，香粉笏頭薰。仿佛女冠子，莊嚴老道君。魯風休沒盡，添個兗州雲。

懶漫伸教度，殷勤製得來。何斯野老足，當彼美重臺。澤雉從容步，仙覺戢翼回。煖深瓜逕曳，寒盡葛霜猜。【註七四】

龐內、蓋郎為誰，不詳。傅山在甲申後，居住在土堂村、松莊等地，都在太原郊外。平日接觸的以村莊中的百姓為多。此處的做鞋和送鞋人不似文人，而像是莊裡的鄉親。來人直言欲以鞋換字，絲毫不加掩飾，俗是俗了些，倒也誠實得可愛。如此的殷勤、坦誠，又是好鞋，傅山看了很高興，興致一來，欣然命筆，寫了四首詩，並大概用此詩寫了四條屏，或是一手卷。蓋郎不但得了字，還得了詩，自然喜出望外。認識傅山，在家裡掛一張青主先生的字，對那些粗通文墨或根本不識字的鄉親來說，不啻為極大的榮耀。至於詩中用典，懂或不懂，關係不大。關鍵是，字與詩都是「傅先生為我寫的」。

傅山曾為救貧而作書。他多次抄寫自作「點污」絕句，詩的小注或跋中常提到這類事。如「有索書為救貧計者隨草。」

【註七五】「或要老字救貧，若果少濟，不枉壞絹素也。」【註七六】

因其特殊的人生經歷，傅山也曾在一種十分特殊的情景中書寫應酬作品。一六五四年，傅山因涉嫌參加反清軍事活動，被捕入獄。在友人和一些仕清的漢族官員的全力營救下，案情不久便有所緩解。但因事關謀反，需中央三法司定案，傅山一

【註七四】：《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一九六。

【註七五】：《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二七三。

【註七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二七四。

時不得出獄。但他在獄中的境況已大有好轉。他在此時，為營救他的友人作書。其中存世的一件就是為戴廷枋所書小楷。（圖五）大概是獄中其它的干擾較少，存世傅山此時所作作品多為小楷，而又以鈔經居多，甚是精謹。【註七七】儘管沒有實證留存下來，但我們可以設想，傅山大概此時也曾為一些清政府的官員和管監獄的人員作書。因為對這些人來說，此時不啻為向傅山索書的好機會。

龔繼遂先生在討論應酬畫時，已經指出了應酬作品的藝術質量和應酬的對象及場合有關。他的這一看法也基本適用於應酬書法。選擇何種書體、何種文字內容來書寫應酬書法，如何題款在應酬書法中都有些規律可循。

以書體而論，明末清初的應酬作品中行草書最多，這是因為行草書的書寫速度快，可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比較多又不需要十分經意的應酬作品。存世的傅山作品中，也有許多尺幅很大的狂放的行草書作品，其中有相當數量的作品質量甚粗糙。不明細故者常以粗頭亂服、狂放超逸譽之。正因為傅山留下不少質量不高的應酬作品，他的書法也常為後人所詬病。【註七八】

傅山的應酬作品中小楷最少，這是因為小楷耗時最多。但小楷是最有自我控制的一種書寫，在質量上容易把握。雖然質量的高低在明眼人那裡還是一清二楚，但只要認真書寫，結構、筆劃精到些，不至有大紕漏。時間的大量投入和一絲不苟的認真程度，即使發揮得不是最理想，也多少能博得受書者的歡心。沒有功勞，也有苦勞。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傅山常以小楷為一些高官和文壇的好友作書。一六六七年，清初著名金石書法收藏家、當時任山西按察副使的曹溶（一六一二—一六八三）要離開山西，傅山為曹溶書《金剛經》贈別。曹溶《靜惕堂詩集》有〈留別傅青主〉一詩，詩中有小注曰：「青主以所書金剛經贈我」。【註七九】存世的傅山寫經作品，除一件為篆書作品外，都是由小

【註七七】：參見白謙慎：《傅山研究札記》，載《山西大學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頁七一—七二。

【註七八】：關於後人對傅山書法的批評及其原因，讀者可參見白謙慎：《傅山為陳謐書草書詩冊研究》，《故宮文物月刊》，一六卷第四期（一九九八年七月），頁七四—八三。

【註七九】：曹溶《靜惕堂詩集》（雍正三年刊本），卷三四。

楷書寫的。金剛經爲佛教經典，字數極多。傅山爲曹溶所書《金剛經》，當亦是以小楷鈔錄。傅山之子傅眉（一六二八—一六八四）也曾爲傅山的友人、陝西學者收藏家王弘撰書小楷金剛經。【註八〇】

傅山於一六八一年（庚申十二月）爲已致仕的康熙朝刑部左侍郎高珩（一六一二—一六九七）書小楷《孝經》冊，冊頁現藏南京博物院。（圖六）此時傅山已是七十四歲的高齡，依然以小楷鈔錄《孝經》，可見他把這作爲不同一般的應酬。

傅山還很可能爲曾任山西布政使和寧夏巡撫的孫茂蘭寫過小楷。劉雪編《尊顏堂帖》中，收有傅山小楷數行，後有傅山題跋一段：

久不作楷，承簦兄督復爾。棘手朽腕，行老顫不能自持，兼以器非犀利，未免有馬捕鼠之醜。若以楷求，開罪鍾、王，其何能追！或遇草淺獸肥、手柔弓燥之際，無心而作，冀有可觀。然亦自解，其實技止此耳。

信中「簦」即爲「義」之異體字。所以「簦公」亦即「義公」。孫茂蘭號「義軒」，所以此處「義公」極可能就是孫茂蘭。【註八一】孫茂蘭，漢旗人，一六四七—一六五二年在山西任官時和傅山結識並成爲友人。孫茂蘭雖爲生員出身，但雅好文藝，並曾在一六五四年的「朱衣道人案」中爲營救傅山出過大力。【註八二】爲其作書，傅山自然不會馬虎。但應酬時，也并非總是可以發揮出最佳水平。所以傅山說，「或遇草淺獸肥、手柔弓燥之際，無心而作，冀有可觀。」言下之意，在紙筆精良、心手雙暢之際，我或可寫出更爲可觀的作品。

一六八四年，傅山臨終前，因獨子傅眉已先其病逝，兩孫尚幼，致信曾任清政府吏部尚書的魏象樞，向其託孤。信中云：愚父子學莊、列，而一旦決癰潰疽矣。兩孫孱少，內外眷屬無可緩急者。羅叉外侮，寔繁有徒。特遺此書，求加護持。人心險毒，轉眼莫必。環翁知我爲我，使此兩兩孱少得安臥畝間，隔世拜惠，乃莊子所謂「死生同貫」者也。三

【註八〇】：王弘撰：《北行日札》。

【註八一】：詳細考證見白謙慎《傅山研究札記》，頁七二—七三。

【註八二】：詳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黿》，頁一〇六—一〇九，一一三。

十年前手書「曾子問」一卷，寶奉爲贄。【註八三】

傅山言詞懇切地向魏象樞託孤，並贈魏象樞自己的書法作品。「曾子問」爲《禮記》中之一卷，傅山當以小楷書此。此時年邁體衰的傅山大概已不能再捉管爲魏象樞作小楷，便將珍藏了三十年的舊作鄭重地贈送給魏象樞。此件作品雖非應酬之作，但傅山在託孤時將它作爲送給老友禮物，也足見其對小楷作品的珍視。日本二玄社曾印日本某私人藏「曾子問」小楷冊，疑即爲傅山贈魏之作。（圖七）學者們一般認爲傅山是在康熙甲子（一六八四年）夏去世的，託孤也應在一六八四年。倒推三十年，贈魏象樞的小楷應作於一六五四年左右。藏於日本的小楷《曾子問》冊頁，正是書於一六五三年底或一六五四年初（癸巳冬）的作品。此冊後有傅山作於甲辰（一六六四）的題跋如下：

癸巳冬教眉、仁爲小楷，書此。于今十二年矣。眼花廢書來近二年，客冬右臂作痛，不敢捉筆又七八月矣。偶檢敝簾，自覽字無足存，然寫時敬謹之意固在行間。兒輩知之。

贈給魏象樞的那件作品，很可能就是這件傅山自己珍藏了三十年的小楷冊。但傅山致魏象樞札中說是卷，日本所藏爲冊。這大概因《曾子問》爲《禮記》之卷十九，故傅山在致魏象樞札中稱之爲《曾子問》一卷。儘管傅山在甲辰跋自書小楷《曾子問》中聲稱「字無足存」，但傅山本人在這件作品上蓋了數方不同的名章，足見他實際上是頗看重這一作品的。更能說明問題的是，在這件作品上，還有傅山子姪傳眉、傳仁的名章和「傅氏家藏」一印。從目前存世的傅山作品來看，鈐有「傅氏家藏」一印的都是傅山比較精到的作品。不管日本二玄社所印究竟是否傅山贈魏象樞的那卷《曾子問》，毫無疑問的是，傅山在託孤時贈魏象樞的書法一定是相當精到的作品，而且應爲小楷。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傅山從一六四六年旅居汾州至一六五三年底定居太原近郊土堂村後這段時間的作品，我們會發現，這一時期的作品總體上來說寫得比較精致些。鈐有傳眉和傳仁名章的又一件傅氏家藏的傅山作品是小楷《莊子》〈逍遙遊〉篇

【註八三】：《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五〇四。

（現藏山西省博物館），也書於一六五三年底或一六五四年初。（圖八）全篇是用顏體端楷抄錄，寫得十分用心。篇後有傅山短跋：

癸巳之冬自汾州逖寓土堂，行李只有《南華經》。時時在目，遂寫此數篇。尚有養生主一篇，字更小於此，為人取去。而這件傅氏家藏的小楷《逍遙遊》冊頁，傅山在晚年也可能送人了。傅山在臨終前向魏象樞託孤時，還給魏象樞的弟子、曾任刑部山西司郎中的李振藻（字天葩，號約齋）寫了一札：

當世盛德忠厚，孰有如代郡李先生者哉！私心向往者，十餘年矣。愚父子怛焉長逝，特以兩孫爲託，孱弱無依，窮鳥不能不投長者之懷也。詒環翁（筆者案：環翁即魏象樞）一字，並求轉致。手寫《寓言》一冊奉贄。弟山頓首。【註

八四】

此處《寓言》即指《莊子》。【註八五】傅山送李振藻的冊頁，應爲小楷，很可能和《曾子問》冊頁一樣，爲傅氏家藏多年的作品。【註八六】

除了官宦，傅山也曾爲志同道合的友人作小楷。如陝西學者李因篤，顧炎武和傅山對其極爲推崇，認爲他是清初詩壇繼錢謙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後的領袖人物。李因篤曾拜謁明陵並有軍都詩十三首紀其事，傅山專門以小楷抄錄李詩，並配以十三景，寄託明遺民對故國的懷念。【註八七】

魏象樞，高珩，曹溶爲高官，李因篤是清初著名文人，他們文化水準高，藝術鑑賞力相對也高。爲他們作書，當非一般性應酬。

【註八四】：《傅山全書》，頁五〇五。

【註八五】：《史記》（莊周傳）云：「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六三卷，頁二一四三。

【註八六】：《逍遙遊》冊頁上尚有收藏印「雁門馮氏珍藏」。這可能是李振藻後將這作品轉讓給雁門馮氏了。雁門馮氏在清初有兩人爲顯宦，一爲馮如京，曾任廣東布政使。應和傅山認識。另一爲馮雲驢，此人也認識傅山。

【註八七】：李因篤：《復許學憲》：「拙集內篇頗多散葉。軍都詩其在太原徵君家者，嘗許作楷書又繪十三圖。」《受祺堂文集》，卷三，頁一三。

傅山一般不輕易以隸書應酬。他曾說：「至於漢隸法，〔吾家〕三世皆能造奧，每秘而不肯見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醜陋古樸也。」【註八八】這段話進一步告訴我們，字體的選擇常要根據應酬的對象來決定。選擇何種字體來應酬，也頗能反映出一個時代對某種字體的珍重。在傅山那個時代，他還不太以隸書來應酬，但到了清代中期後，由於碑學的興起，以篆隸作品來應酬的數量明顯增加。

如前所述，明清應酬書法中，以行草書居多。傅山也不例外。在行草書中，傅山的精品多在於為老友書寫的壽序條屏，這些條屏的文字多為傅山親自所作。一六五六年，傅山的友人魏一鼇在山西為官十年後，辭官將返老家保定。魏一鼇在山西任官期間，和傅山結為莫逆之交，多次接濟貧困中的傅山，並在傅山因與反清地下活動有牽連被捕入獄時，冒著生命危險，出庭為傅山作證，使傅山得以安然出獄。魏一鼇臨行之際，傅山代表山西的朋友們為其書行草十二條屏贈別。（圖九）文字為傅山自撰，完全是針對魏一鼇而發的議論。【註八九】這件作品在傅山的作品中並不算是最精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傅山在書寫這件作品時很不經意。對這樣一位至交的臨別作品，傅山當然不會草率從事。但認真並非就一定會創作出得意之作。由於作品的文字內容是專門為受書者所作，彌補了作品藝術上的一些不足。作品懸掛在屋中，那篇意味深長的散文向人們展示著主人和一位清初著名學者和書家特殊的關係。在傅山的作品中，類似的還有為友人曹偉等所作的壽序，都以十二屏條的形式寫出，質量也都比較精。

深諳應酬書法三昧的傅山對文字選擇的重要性當然是十分明瞭的。戴廷枏五十歲生日時，傅山專門作詩為賀。傅山有與戴一札及此事：

文誕不欲外構世俗，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為台丈作今年九口詩二十四韻，亦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幸教我。【註九〇】

【註八八】：《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八六二。

【註八九】：關於這一作品的詳細討論，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鼇〉一文，頁一一四—一二八，一三五—一三六。

【註九〇】：《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八二—四八三。

話說得很平淡尋常，「草草以村老所能之技」為友祝壽，但筆鋒一轉，「不能漫移之他人者」，寥寥數字，點明這是專門為老友作的。老友的盛情，呼之欲出。

除了書寫文字的選擇外（這可分為自撰和選錄他人的文字），題款在應酬書法中也十分重要。有無上款，是長款還是窮款，款怎樣寫，都很有講究，和接受者為誰有直接的關係。特別是如果書寫的文字內容是古人的作品，題款更是使作品私人化的唯一機會。對題款的重視，在傅山致魏一鼇的一通信札中表露得極為清楚。一六五六年左右，魏一鼇曾託傅山為他的一位名為淄川的朋友寫字。對魏一鼇的這一請託，傅山極為慎重。他曾在給魏一鼇的一通信札中，專門詢問那人的興趣愛好，以使自己的題款專門化，而不是泛泛地可移用他人。傅山這樣寫道：

與淄川作字即奉命。但題後須及尊意，不知當如何書，又不諳此君性情何如。尚求一教。【註九一】

傅山如此慎重，實在是因為他欠了魏一鼇的許多人情。為一位並不認識的人作書，要兼顧到作為中間人的友人的情面。魏一鼇為友人求傅山的字，傅山不但要寫，還須認真。草草應付，受書人若不滿意，會認為傅山不給面子，令魏一鼇難堪，求不若不求。在事關重要的應酬中，分寸感很重要，所以傅山要仔細向魏一鼇詢問一位自己並不熟悉的求字者的性情、背景，以便把題後寫好，寫得令求字者歡喜。私人化是應酬的一種重要技巧。

對於比較重要的人物和場合，傅山不但書寫時要鄭重其事，有時連如何裝裱都得親自過問。【註九二】

傅山在他那個時代享有盛名。戴廷枏曾說，「黃先生石齋與馬先生君常論書，晉唐後首推公它，次李燧臣，次王覺斯」。

【註九三】李因篤所撰「為美原鎮居民壽邑大夫郭公九芝序」云：「太原徵君草隸絕世，有索靖、王羲之風。」【註九四】王

【註九一】：此札為香港葉承耀醫師藏傅山致魏一鼇信札手卷中第十八札。詳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鼇》，頁一二五—一二三。

【註九二】：在致戴廷枏一札中，傅山寫道：「臬司畫冊，不得不應，恐畫成促裱，則無邊材，求兄先為之地，不必宮綾，但淡月白絹即可耳。」（《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七八）。此處臬司應指曾在山西任按察使的楊思聖。

【註九三】：戴廷枏：《跋家藏傅道翁三世墨蹟》，《傅山全書》，第七冊，頁五一—一八。

餘佑云：「青主翰墨，追鍾王，得其一字即比兼金也。」【註九五】名聲大了，應酬必多。應酬多了，就忙。整日爲還不盡的人情奔波忙碌。無可奈何之中，傅山常會發一些坦白得有些玩世不恭的感歎：

西村住一無用老人，人絡繹來不了，不是要藥方，即是要寫字者。老人不知治殺多少人，污懷多少綾絹扇子，此輩可謂不愛命、不惜財，亦愚矣。【註九六】

疲憊煩惱中，傅山也會發出如下一些忿忿之言：

因無貸之難，遂令老夫役人之役。凡人來，不忠厚者多。【註九七】

他一方面抱怨那些趁他貧窮而迫使他低價鬻書的人們，一方面又爲一技所累而慨歎。懊喪之極時，看到兒孫書法有進步也喜憂參半：

昨見蓮和尚【筆者案：即傅山孫子傅蓮蘇】臨右軍七八帖，甚可喜。吾幾爲此事死，爾復欲造此三昧耶？萬萬不可開此門戶。傳語後人，勿復學書，老夫痛懲之矣。【註九八】

他實在不希望自己的子孫步自己的後塵。可是他又不希望他們通過科舉途徑到滿族政府中去謀個一官半職。因此「傳語後人，勿復學書」，只不過是一時的忿忿之言。書法是傅家的重要收入之一，怎麼可能自斷生路呢？！傅山在致友人魏一黿的一札中就哀歎「隱非隱、現非現」的尷尬處境。【註九九】在清初的困境中，傅山爲堅持遺民立場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的。

傅山名氣大，各方前來慕名拜訪的人也就多了。來的人也必雜，各懷目的。不勝煩惱之中，對認識自己的人多的害處就

【註九四】：李因篤：《受祺堂文集》，卷二，頁五一六。

【註九五】：王餘佑：《簡孔公翔》《五公山人集》，（康熙年間刊本），卷二二。

【註九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九〇〇。

【註九七】：同上，頁八六六。

【註九八】：同上，頁八六三。

【註九九】：見傅山致魏一黿札。見白謙慎：《傅山與魏一黿》，頁一〇三。

格外有體會。傅山在一段筆記中曾這樣寫道：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常笑此兩句。知己滿天下，尚有已哉！何人不識，與鴉噪鮑佐何異。【註一〇〇】

交遊一道，不如不交遊好。真可與交，不見面亦交。若匪人，日夕傾倒，何益於我？徒陪卻好功夫耳！【註一〇一】

傅山當然不是沒有感情、不講情義的人，但名氣大、交遊廣，應酬也自然會多。應酬多了，「徒陪卻好功夫」，多少有價值的事情（如著述）想做也做不成，令人抱憾。傅山的後半生對一些友人就抱有這種又愛又怨的矛盾心情。讀一些他寫給朋友的信，我們多少能感覺到他的這種心情。一、二知交本不成問題，可知交們也有知交，有親友，這樣的關係網就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人託人，人欠人的人情，往使循環，沒完沒了。在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中，親疏的關係到了哪一層傅山可以忽略不計，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當應酬越來越多，來不及應付時，便自然而然地出現代筆現象。傅山的兒子傅眉和姪子傅仁（一六三八—一六七四）都是他的代筆人。但代筆也有問題：其一，求字者爲了避免拿到代筆作品，常要求傅山當面書寫。於是便出現了「俗物面逼」的現象。但這在他人來說，也是很在情理的事，既然送了禮或付了錢，爲何不得張真的。其二，代筆的名聲傳出後，容易引起人們種種猜測：何爲父，何爲子。傅山在一條筆記中這樣寫道：

強作解人，又輒云能辨吾父子書法，吾猶爲之掩口。大概以墨重筆放、滿黑極權者爲父，以墨輕筆韶、行間明嫺者爲子。每聞其論，正詭癡耳。三二年來，代吾筆者，實多出姪仁，人輒云真我書。人但知子，不知姪，往往爲吾省勞。

【註一〇二】

傅山一方面承認了他晚年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傅仁的代筆。但同時，他也指出，那些面逼他作書的人，得到的即使是真

【註一〇〇】：傅山爲《古書雜書冊》，《書法叢刊》，一九九七年第一期，頁五六。

【註一〇一】：《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八九二，傅山還有一些交友的議論，見頁八九二、八九三。

跡，也不足爲貴：

使拙書不足觀，即真者安足貴邪！【註一〇三】

從存世的作品來看，傅眉和傅仁的書法都很像傅山的書法，真假本難辨。但在種種自命不凡的猜測下，真的會被當成假的，假的也可能當成真的。最通常的問題就是，因爲傅山書名已大，凡是有傅山款但質量又不太高的作品，就很容易被認爲是傅眉或傅仁所作。對是否代筆，一般人並不計較。有時知道是代筆，也睜只眼閉只眼。因爲東西確實出自傅家，款印也是真的，傅家也認這個賬，要就要那個名氣，字好些壞些，是否代筆，問題都不大。若偏偏碰上了自負有眼力而又有點脾氣的人，事情就不太好辦了。人不但會罵街，也會到處傳話的。曾於康熙七年至十二年（一六六八—一六七三）任山西交城縣令的趙吉士（一六二八—一七〇六）曾在給戴廷枏的一札中這樣寫道：

徐、盧狂薄士耳。裴聞喜有云，先當器試，而後文藝。使青主先生（傅山）竟欲與徐、盧二公較品格，予且薄之矣。四知堂三字確非此翁手筆，當出伊令嗣捉刀耶。生於書甚拙，然於筆墨蹊徑之外，頗有微解。雖鑄而懸之，適爲傅公貶聲價也。【註一〇四】

趙吉士把傅山的代筆看得極爲嚴重，直把它視爲道德上的問題。具體的詳情我們已無法得知。大概是趙吉士慕傅山書法之名，託戴廷枏轉請傅山爲其書匾。戴遵囑辦了此事。趙不滿，認爲是傅眉代筆。戴作了解釋。趙不信，堅持認爲「四知堂三字確非此翁手筆。」遇到這種事，很難辦。你解釋，他不信。重寫亦行不得，因爲這等於承認那先前的確爲代筆。所以亦只能讓它懸在那裡，任趙吉士在他人面前貶傅山的聲價了。

【註一〇二】：同上，頁八六四。署款傅山的大字有多少是他本人寫的可值得研究。傅山曾說：「老人右肋滯氣，實因少年抄書而得，至今握筆即動，放筆半日，徐徐乃安。大字便得三兩日將息，所以不作大字，避苦耳，人不知也。」同上，頁八六四—八六五。

【註一〇三】：《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八六六。

【註一〇四】：趙吉士：《牧愛堂編》（康熙間山西刻本），卷四「書」。

趙吉士所執意要貶低和損壞的就是「傅山」這個名字和與之聯繫在一起的聲譽。在傅山生活的那個時代，他的名字已成為了一種具有文化影響力和社會功能的象徵符號。不但書寫人要利用這個名字，中間人（如戴廷斌）也需要這個名字，一般受書人也需要這個名字。這個名字便在不同的場合（文化品生產的、周轉的、消費的場合）發揮著不同的功能。在許多場合，這個名字已不必和藝術質量掛鉤。藝術質量的重要性已讓位於這個名字所具有的多重象徵意義。在家中掛一張傅山先生的字，對那些真正喜歡書法的人們，它自然會成為欣賞品評的對象；對那些喜歡附庸風雅而被傅山視為「俗物」的人來說，它向來人昭示著自己的「高雅情趣」；對一個山西文化圈的人來說，它不但意味著主人和這位山西文化界的祭酒可能的特殊關係，它還代表著山西和全國士林的關係，因為在清初，凡過境太原的文人騷客，幾乎沒有不拜訪傅山的；對那些研究學術的人來說，不但這張字本身就代表著淵博的學問，它還和這樣一系列的名字相聯繫：孫奇逢、顧炎武、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〇九）、閻若璩……；對那些清政府中的漢族官員來說，它展示的是他們和明遺民們之間割捨不斷的關係，出仕異族政權的愧疚，也因為有了這層關係而獲得某種程度上的補償。「傅山」這個名字在清初的象徵意義，頗可從清初顯宦、顧炎武的外甥徐乾學（一六三一—一六九四）為傅山的友人、劉體仁（順治十二年進士，官吏部郎中）的《七頌堂詩文集》所作的序中窺見一斑。序云：

穎川劉公勇先生，天下駿雄秀傑士也。……經太原特訪傳青主於松莊，坐牛屋下對賦詩移日，其高尚如此。【註一〇五】

賦的什麼詩、賦得好不好在此並不重要，只要能和傅山一起在牛屋下賦詩移日，在清初便已經是「高尚如此」了！

因此，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應酬書法發揮得理想不理想，是不是代筆，已沒有多大的關係。只要有傅山的名款，是從傅家拿出來的就行。傅山書法的社會功能已超出了傅山本人和人們對他的作品好壞的關心。是那個社會需要名人，需要那可以代表名人的作品。而傅山亦同樣地需要這個社會。他在他的子姪的幫助下，扮演著、完成著他的社會角色。

應酬中最難對付的就是老朋友的請託。對老友、摯交本人求的東西，因為關係深，不宜由子、姪捉刀，否則不但於朋友

【註一〇五】：載劉體仁：《七頌堂詩文集》（同治七年〔一八六八〕穎川劉氏刊本）。

的面上說不過去，而且容易被辨認出。這就是爲什麼有些文債傅山遲遲未還的緣故，因爲他要親自書寫。在致戴廷枏的一札中，傅山說：

伯巖冊子，屬寫者三年，今附丈所，若過平干時，可致之。【註一〇六】

伯巖即殷岳，河北雞澤人，楊思聖、申涵光（一六二九—一六七七）的摯友，也爲清初北方著名的詩人。通過楊思聖的關係，殷岳亦成爲傅山的好友。他屬傅山寫冊頁，傅山不便推辭，但一拖就拖了三年。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戴廷枏的身上。在爲戴廷枏所作草書〈千字文〉後，傅山這樣寫道：

楓仲要書千文，實三四年矣。老我兩腕如鐵，豈復能矜莊應之。兼以眼花，下筆黝駐，皆屬猜擬。今春既杪，端驢將入管岑深處，而使適來勒理前約。敗筆一枝，是村僑終日握之以刷土牆者。雅與老腕相宜。丫植其豪邁，然支離實嘗厥真，振嬾終之。再一徊眸，欲不自辨。本不良書，而謬膺知聲，良可笑也！若復邁山，便須嗔我管城大不邊幅，是非所望於楓者耶？山附記。【註一〇七】（圖一〇）

如果不是戴廷枏派人來催促，也不知道傅山會拖到何時。有的時候，時間長了，便忘了誰爲囑書人。拖得長的，竟有七、八年的。傅山〈黎娃從石生序〉冊頁是這樣開頭的：

小冊子置硯北八九年，忘其所屬爲誰。日岸伯敦小冊子寫否，始憶其爲岸伯物。岸伯有奇遇，嘗駐野人之家，輒爲書黎娃事云。【註一〇八】

從冊頁上的文章可以得知，岸伯，姓石，名岫，爲孟縣一窮秀才，和困境的傅山爲貧賤之交。拖了一位窮朋友的字七、八年，傅山大概多少有點歉疚，專門爲其愛妻、一位從良的妓女黎娃作了這篇序書於冊子。

【註一〇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七四。

【註一〇七】：《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〇〇。此處根據原作影印件作部分改動。

【註一〇八】：《傅山全書》，第一冊，同上，頁三七二。

在應酬中，要是不那麼熟的人來求字倒也好辦些，一是好推辭，二是開口講條件要錢也不用不好意思。甚至可以把價錢開到對方不能接受的地步來推辭掉一些不那麼重要的，可寫可不寫的索求請託。對老朋友便不能這樣了。老友要是知趣還好，不知趣也就麻煩了。對老友自己要的東西，拖固然是一招，但有時老友是代別人求字，他就可能要督催。因此，不但有「俗物面逼」作書的情形發生，【註一〇九】朋友也常代友人催促：

拒兄要書，老臂痛風，實不堪畫驚矣。渾丈面督，胡亂塞責。一笑。松僑老人真山。【註一一〇】

此處所說渾丈，乃傳山的老朋友朱伯（伯渾）。朱為明宗室，汾州人，和傳山關係極深，傳山的詩文中常提到此人。當朱出面為一位名叫拒兄的朋友督促傳山動筆，傳山不得不寫，但在款中以「渾丈面督，胡亂塞責」和朱調侃一下。在傳山的生活中，類似的事情經常發生。傳山在為友人書寫了一件唐詩的書法後，這樣題到：

老夫野鷺，原知不足重。嗜痂者每索之不已。今人多惡，而居實亦然。試觀之，好處何在？松僑山。【註一一一】

居實即白孕采，平定州人，傳山摯友。他請傳山作字，傳山不能不寫，但在題後中依然不忘和老友開個玩笑：「別人不懂，看我名氣大，不斷索求。可你白兄為什麼也來湊這個熱鬧呢？」玩笑之辭中，也透露出他的弦外之音。但老友督促也常有其原因，有時是因為已答應了他人，若是為壽禮、婚禮而求，有時間的限制，不得不催。

所以，對老友求的字，寫還是要寫的。但傳山有時也通過種種方法，向老友們表示自己的苦衷。傳山有一札向戴廷枏訴說寫字之苦：

老人聽著寫字，生頭痛矣。勉強寫後，兩眼角如火燒，少選膠膏餬之，逕不能開一縫，其苦如此，非誑言也。即以字論，尚成半個字耶！有命即書壞扇二柄，非弟罪也，若有人非，請分任之。楓老仁丈侍史。弟山頓首。【註一二二】

【註一〇九】：《傳山全書》，第一冊，頁八六四。

【註一一〇】：《傳山全書》，第一冊，頁二八七。

【註一一一】：傳山：《盧照鄰長安古意書後》，同上，頁四〇〇。

【註一二二】：同上，頁四七九。

老朋友們又何嘗不知傅山應酬的負擔很重，但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他們也有親友，也有應酬。代他人求字，是他們應酬和社會責任的一部分。人們若知道你是一個著名書法家的老友，托你代求字，你若不求，人家不是說你架子大，就說你沒本事。人托人的事時常發生。實際上，傅山的很多作品，都是應朋友的請託為他人書寫的。【註一二三】況且，也正是上面提到的這幾位最親近的朋友們，在傅山困難的時候，鼎力相助。對他們的請託，傅山焉能等閑視之！

有的時候，朋友也比較知趣，並不沒有限制的索求。傅山有位河北的朋友名申涵光，是著名的詩人。他到山西去拜訪傅山時，大概傅山已為他寫過字了，他不便不斷地索求，就請戴廷枏為他代購傅山的作品。戴廷枏因藏有比較多的傅山作品，就將自己藏的一件傅山傳眉父子合作的畫冊送給了申涵光。【註一二四】這一例子說明，對友人的叨擾程度，要看交情的深淺和自己能給予多少回報。相比之下，作為老朋友的戴廷枏要傅山寫字就容易些。申涵光和傅山雖很投機，但相交時間較短，就難些，他自己不太意思多索求，這屬於知趣者。

為了減少應酬，傅山有時甚至以「焚硯」來作為借口。在「祝錫予六十壽十二條屏」的小記中，傅山寫道：

老臂作痛，焚硯久矣。喜好友子弟見過，數道高誼如雲，感嘆無喻，遂不覺欲枯之臂頓輕。【註一二五】（圖一一）這段題後有多重作用，一是「焚硯久矣」，為老友破例；二是「老臂作痛」帶病作書，實是不易；三是「好友子弟見過，數道高誼如雲」，被友情打動後，方才動筆；這樣的題後也很給求書人面子，它點明是求了多次，作書者才破例帶病動筆的，因此殊為珍貴。

即使在當代，我們有時也會聽說一些老書家封筆云云，這常不過是對外界的託詞。應酬太多了，藝術家們就必須想出種

【註一二三】：關於這種請託的方式，清初人的文字中屢有記載。在台北何創時書法基金會收藏的書法中，有傅山的友人殷岳寫給他的親戚的數札。其中一札談及為人求申涵光字一事。但殷岳在信中和友人講明，他將盡力而為，能否成功，並無把握。

【註一二四】：此冊現藏美國密歇根大學美術館，冊後有戴廷枏跋云：「……癸卯（一六六三）季夏，晤覺盟太原齋中，縱談今古，流連桑日，屬余購之。因出素藏以贈，是十年前得之西河道達者。知覺盟之不以為蘭，即以為馬，畫者，購者，贈者，指之非指，漆園之叟得之。」

【註一二五】：《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二四七。

種辦法來減輕應酬的負擔。家人擋駕，抬高價格，都是招數。「封筆」也是一種借口。所謂「封筆」會減少些應酬，但這應以不給家庭的政治、經濟利益帶來嚴重的損失為前提。因此，封是不會徹底封的，除非是真的躺在床上動彈不得。「封筆」云云又有雙重功能：一可擋去一些可以擋去的應酬，對擋不住的應酬，「破例」開封，更能提高這一應酬的價值。同時，它也對索書人發出「下不為例」的訊息，希望其知趣。

有時傅山不說封筆，而是說很久未寫字了。在臺灣某私人所藏的一草書手卷後，傅山有如下的題後：

老病不理筆硯已一年餘。如此塗抹徒壞佳綾，於古人臨池可曾夢見。不但以右軍影子或可自恕，觀者亦不必苛求其似與不似，見其顫掣便知其老。傅山時年七十四歲。

傅山晚年患眼疾和痔瘡，常為疾病所苦。但為應酬事，他常不得不帶病作書。他存世的不少作品的題款中都說自己是帶病作書。傅山曾有「題書自笑八韻」，說明他從驢上墮地、腰受傷後，朋友還請他寫字。詩中有「腕原羅鷺拙，腰復墜驢痛。不謂管城重，真如雍夫春」句。詩後有小跋云：「郝舊甫持綾子索書。書已自顧，逕似正一家治鬼符一張，不覺失笑。遂有此作」。【註一二六】這首詩傅山不止寫了一次，其中一件後有小跋：

老病逃書，真如蒙童之逃學。鑑盤詞兄出此綾索書，勉而應之，殆不成字，一笑而已。【註一二七】他又曾說過：「老憊手戰，唐突右軍，壞此素綾，但增惡業。七十三歲老人傅山。」【註一一八】

在致老友文玄錫的一札中，傅山也備述病中作書之苦：

弟自瘡發來，兩手兩臂腫痛，于已九十日許不見消散。不理論筆硯事，亦百日餘矣。違教久，不欲負來命，滿紙敗筆，先報聯命。扇求稍寬三兩日，且弟處實無書扇之筆耳。弟無印丹，故不用名章。玄翁道丈先生。弟山頓首。【註

【註一二六】：《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二四二。

【註一二七】：《傅山全書》，第一冊。

【註一一八】：傅山：《臨王羲之詩文書後》，同上，頁三九九。

一一九】

此處所說無印丹而不用名章似爲託詞，大概是因爲字寫得看不過去，又不欲重寫（重寫要貼綾絹紙墨）所以才不願蓋印。這封信札告訴我們，興致高時要寫，不高興時也要寫。健康時要寫，生病時也要寫。寫得好時要寫，寫得不好時也要寫。總之，任務要完成。「書法」本是雅事，但本來可以是充滿情趣的藝術活動，但書法家卻常被這種沒完沒了的應酬弄得麻木不仁。但奇怪的是，不管傅山自己本人坦率地說「滿紙敗筆」，作品一旦出手後，就像有了自己的生命，開始周轉，由一個收藏家轉入另一個收藏家，被著錄，被品評，被懸掛，被買賣，被裝裱和再裝裱，由不得創作者左右。

在清初書壇，傅山享有盛名，但盛名也給傅山以壓力。傅山當然是深諳書法三昧，並且確實創作過足以傳世的佳作。他對自己的作品的好壞心中還是有數的。他知道，大多數他的應酬作品，是草率應付的結果，並不理想。他會有如下的自評：

文章小技，於道未尊，況茲書寫，於道何有！吾家爲此者，一連六七代矣，然皆不爲人役，至我始苦應接。俗物每逼面書，以爲得真。其實對人作者，無一可觀。且先有忿懣於中，大違心手造適之妙，真正外人那得知也！【註一二〇】他直以「無一可觀」四字來評價自己的許多應酬書法，激憤之情躍於紙上。傅山也知道，「佳書須慧眼，俗病枉精思」【註一二一】大多數求書者不過是「亂讓吾書好」，但並不知「吾書好在那」的外行，【註一二二】本不須對他們的索求太認真地投入。但畢竟有內行在。好壞精粗高下，想要瞞過內行的眼睛是很難的。這使傅山多少感到不安。這也就是爲什麼傅山要在給朋友的字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爲自己開脫。從這點來說，傅山是有良心的。他在半是調侃半是認真的題跋中，請求那些內行們體諒自己的苦衷。

【註一一九】：《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八六。

【註一二〇】：《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八六三—八六四。

【註一二一】：《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一九〇。

【註一二二】：《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一一九。

傅山也常強調客觀原因。或是紙筆不佳，或是身體不好。在臺北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收藏的傅山為楊氏兄弟所作雜書卷中，傅山寫道：

楊五哥、七哥持此卷子要書。村僑無筆久矣，禿穎老腕，儘者結構。

在致魏一鰲的一札中，他也寫道：「紙筆村劣，求有」。天津文物商店藏有傅山一雜書冊，其中一頁有傅山的小注云：「軟筆大敗人意」。但傅山在這件作品上蓋了好幾個印章。其中尚有傅眉的印章，不能說完全不經意。把這樣的作品放在家中，人們讀後知道傅山自認為若筆好，他能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也正因為如此，對付外界對自己應酬作品批評的另一種辦法便是在家中收藏一些質量比較好的作品，這樣一方面可以保留傅山各時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時，有慕名而來的同道來相見時，也可有一些比較能代表自己水平的東西給他們看，不致因一些質量粗糙的應酬作品讓內行們得出「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的印象。從存世鈐有傅氏父子印章的文稿，如小楷〈傳史〉，小楷〈石鼓文考釋〉等來看，傅山是有意識地保存自己一些較精的作品。這樣做可一舉兩得，即保存了自己的著作，同時也有些讓人看的書法。但這樣做也有個問題，見過傅山精品的友人，能知道傅山的作品是否達到他的比較高的水平。正因為如此，傅山寫得不滿意時，就要向老朋友解釋。對外行人，傅山勿需考慮這麼多。我們研究傅山的應酬作品的意義之一在於，這些應酬作品常說明了書法家們在多大的程度上容忍他們最為粗糙的作品出手。

如前所述，很多的應酬作品是用來進行人情交換，維繫關係的，並無當下直接的經濟動機。而這種使用藝術品的方式，是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禮尚往來、人情酬酢存在於各種文化中，只不過在中國文化中，誠如楊聯陞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這種活動具有悠久的歷史，高度的自覺性，並廣泛地應用於社會制度上，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註一二三】古代的經典和先哲於此多有論述，把它提高到一個社會能否和諧地運作的高度來認識。最早之一也經常為人們所引用的便是

【註一二三】：楊聯陞：〈報——中國社會關係的一個基礎〉，載費正清編、段國昌等譯《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八一年修訂版），頁三五〇。

《禮記》中的那段話：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註一二四】

以報為交往基礎的應酬書法固然有其實用的一面（如它可被視為一種長期的人情投資），但如果我們過於執著於功利性的解釋，將會忽略應酬藝術中許多複雜的層面。友誼和功利的結果並不相悖。如果我們過多地把它看成功利的行為，則無法解釋為何傅山寧願過貧困的日子而不出仕。同樣，即使是建立在道德信念基礎上的關係，有時也可以帶有功利性的交往。傅山和戴廷斌的交往可以說明這一點。

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和中國社會中的各種社會關係有密切的關係。在傳統的家族之內，親疏內外有具體的規定，也因此有相應的往來應酬方式。宋元以後的書儀、日用類書等對此常有極為詳細的討論。由家族而擴大至社會，在中國人的朋友圈子裡，也有一種類似的編碼（coding）方式。它的社會編碼體系雖不如家族血親之間的關係與義務的規定那樣嚴格清晰，但也有一種內在的邏輯可循。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們，通過社會化的過程而學習和熟悉這套行為方式。我在研究十七世紀另一位收藏家周亮工的《印人傳》和《讀畫錄》時指出，在這兩個著作中，周亮工花了大量的筆墨來談他和所談藝術家的關係，如交往始於何時，通過何人得識，除了這些關係外，是否還有其它的關係，描述十分細緻。討論周本人和一位藝術家之間關係的文字在長度上經常超出了討論那位藝術家的藝術的文字。這充分反映出了人際關係在藝術品的周轉經營中的重要性。【註一二五】我還指出，周亮工在這兩個文本中，還經常使用一些描述朋儕關係的成語，如「方外之交」等。而在中國成語中，描寫各種各樣的友誼的成語格外多。在《漢語成語辭典》中，以「交」為詞尾、關於人際關係的成語多達二十餘個，如「總角之角」、「再世之交」、「患難之交」、等。這種語言反映出了中國人對朋儕之際關係的高度敏感，以及人們如何在日常

【註一二四】：《禮記正義》，載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〇），上冊，頁一二三。

【註一二五】：見白謙慎於美國高校藝術協會一九九八年年會上提交的論文，"Social Network and Art Transaction: Collector Zhou Liangong (1612-1672) and His Relationships with Contemporary Artist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College Art Association, 1998 年二月二十五日，多倫多。

生活中用語言來將各種社會關係加以分類，並伴之以對相應的行為方式的期待。

中國書法中的應酬基本上是以楊聯陞先生所指出的「報」為原則，但在基本模式的大致規定下，具體的運作，則有相當的零活性。傅山如何書寫他的應酬作品，除了在大的方面如基本禮節的考慮外【註一二六】，還有其它許多因素影響和制約著他最後完成一件作品。如彼時心境如何，交往時間的長短，介紹人為誰，手邊現成的材料，是否有求於對方當下的回報，對方的書法鑑賞水平，一般大眾對他的期待等等，都會給應酬作品的創作以影響。一件應酬書法作品的完成，是多種因素的綜合結果。它的創作是遵循著其具體情景中所產生的特殊的「情景邏輯」而展開的。

在清初，傅山有高士、奇士之譽。清初大儒顧炎武曾在「廣師」一文中說：「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註一二七】傅山的另一位友人畢振姬稱他是「來歷奇，行事奇，詩文書畫奇。」【註一二八】但奇士也要應付俗事。在「如何先生傳」一文中，傅山以對話的方式表述了自己的世界觀。其中有一段如下：

「先生玄乎？」曰：「我不能無情而長生。」……「先生高尚耶？」「我卑卑。」【註一二九】

傅山坦白地承認，他對這個世俗的世界依然有著種種的牽掛。在許多詩中，他都談到，為了生存、為了那難以割斷的世情，他不得不花大量的時間來書寫應酬書法：

驚書有何好，此謬由諸君。作意見不見，制心聞不聞。所希在斗米，其敢望鵝群？自笑慳貪甚，吾能去幾分？【註一

三〇】

【註一二六】：傅山多次談到應酬作品和禮節的關係。如他在致戴廷栻的信中，多次提及如何以書畫為禮品，如何送禮才比較妥當。爰錄一則：「所言與唐采老送畫，不必多。此將去數幅，止可選三二幅（蓮花、雪景二幅差可）。並前年裡兩可行世。小兒倉忙，無好絹好紙。此中礬絹，皆是急作，如南來畫燈材料，不足存也，必不可輕用送人取笑。」《傅山全書》，第一冊，頁四八三。

【註一二七】：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頁一三四。

【註一二八】：畢振姬跋戴廷栻著《石道人別傳》，載《傅山全書》，第七冊，頁五〇二六。

【註一二九】：《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三六二—三六七。

無端筆硯緣多，不敢胡塗說換鵝。這爲世情難決絕，驚書終日替奔波。【註一三一】

人的社會性，使其需要關係網，有求於人而又被求於人，煩固然是煩，忙也確實是忙，累也肯定很累，但人們在忙碌於這種關係網中謀得生存所需的物質的同時，也獲得安全感、溫暖、和存在的意義。塵世的庸俗只不過是它的一面，有時並不是主要的一面。這也難怪傅山在書寫了大量的應酬書法後慨歎道：「這爲世情難決絕」。

以上，我們以傅山爲例，討論了應酬書法的問題。在傳統中國，由於文人書畫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又缺乏現代的畫廊機制，因此藝術品的生產條件，流通方式都呈現了與西方藝術品生產頗不相同的種種特點。對於書法史學來說，研究應酬作品的意義在於，我們能藉此瞭解相當大的一部分書法作爲文化物品在實際生活中是怎樣被創作和使用的。而我們對這些作品合乎歷史的解讀和闡釋，也必須首先建築在對它們的生產、周轉、消費的基本情況比較細緻的瞭解之上。

【註一三〇】：傅山：「起用杜句戲作」之三，《傅山全書》，第一冊，頁一七四。

【註一三一】：同上，頁二七二。

十六卷二期何冠彪〈昇平嘉宴——清朝內廷首次賜宴漢官始末〉勘誤表

誤	正
頁 113 行 1 在內廷裡[△] 頁 119 註 15 行 8 稍旁跪，叩頭，[△] 頁 120 行 1 朝清宮[△] 頁 120 行 7 至 8 一玄燁與賜宴官員共賦柏梁體詩[△] 頁 120 行 11 至 12 （見本文末「『昇平嘉宴』各官班次表」） 頁 127 註 36 行 4 舛錯□漏 頁 129 註 42 行 1 王士禎[△] 頁 130 註 45 文中「栢梁體」原作「栢梁體」[△] 頁 132 行 7 朝朝橐筆侍御□ 頁 134 行 1 「召大臣聯□梁體」 頁 134 行 12 □梁體 頁 135 行 7 至 8 右平左戚（[△]）開明堂 頁 136 行 6 賜表□恭紀 頁 136 行 10 〈九日宴群臣擬栢梁體詩序〉 頁 137 行 15 洪鈞氣轉□韶年 頁 138 行 2 效漢代□梁之體	在內廷裏[△] 稍旁跪，叩頭。[△] 乾清宮[△] 一玄燁與賜宴官員共賦柏梁體詩[△] 衍文 舛錯疎漏 王士禎[△] 文中「栢梁體」原作「栢梁體」[△] 朝朝橐筆侍御牀[△] 「召大臣聯栢梁體」 栢梁體[△] 右平左戚（戚[△]）開明堂 賜表裏恭紀[△] 〈九日宴群臣擬栢梁體詩序〉 洪鈞氣轉叶韶年 效漢代栢梁之體

***The Issues of Ying-ch'ou and Rhetoric in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Case of Fu Shan (1607-1684)
and Tai T'ing-shih (ca. 1623-1692)
(Part I)****

Bai, Qianshen

(Boston University)

ABSTRACT

Ying-ch'ou (here tentatively defined as making works of art for various social occasions)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Chinese calligraphy but also the one least studied. The late Ming-early Ch'ing calligrapher Fu Shan and his close friend Tai T'ing-shih not only left us many *ying-ch'ou* calligraphic works but also discussions about them, providing a basis for an in-depth study of *ying-ch'ou*.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ying-ch'ou*, this article goes on to discuss the issue of rhetoric in Chinese calligraphy, challenging the concept of *shu-wei-hsin-hua*, or "calligraphy as traces of the mind." The article has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provides detailed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Tai T'ing-shih,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al patron in Shansi Province in the early Ch'ing, and on his relationship with Fu Shan. The second section discusses Fu Shan's *ying-ch'ou* calligraphy, while the last amplifies the problem of rhetoric in Chinese calligraphy.

Key Words

ying-ch'ou 應酬

rhetoric 修辭

Fu Shan 傅山

patronage 贊助

shu-wei-hsin-hua 書爲心畫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九五 to 一三三.